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创业活动*

——基于创业类型划分的机制解析

王 博¹ 朱 沆²

(1. 汕头大学商学院, 广东 汕头 515063;
2.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内容提要:如何利用国际循环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提高国内经济活力和技术水平是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内在需求。本文从创业角度切入,探索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创业活动,尤其是创新型创业活动的影响。本文将创业类型的划分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研究,尝试解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促进创新型创业的关键制度要素。本文通过对2010—2018年59个国家268个观测值的实证检验,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会在正式制度薄弱国家表现出更强的模仿型创业促进效应,但仅在制度较完善国家表现出对创新型创业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东道国研发投入、产权保护、金融发展和创业扶持水平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能否有效促进创新型创业的关键因素。上述发现不仅深化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创业关系的理论框架,也为新阶段如何更好地利用外资提供了政策参考。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 模仿型创业 创新型创业 溢出效应 竞争效应

中图分类号:F27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4)02—0072—19

一、引言

在当前一些国家加强对我国技术封锁、试图阻遏我国经济提质升级的情况下,我国需要更好地利用国际循环以提升国内关键技术、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韧性(刘世锦,2021)^[1]。打开国门,欢迎外商投资是国际循环的重要一环,然而,从以往经验来看,外商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陈强远等,2021^[2];李政等,2017^[3])。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外资流入不仅带来了资金和技术,也激活了市场需求和市场主体活力。但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导致对国外技术的过度依赖,抑制东道国的技术能力提升和创新创业活力,不利于经济长期发展。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本土创新创业必将在国家技术升级和产业转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近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持续升高,借助外商直接投资促进高质量的创新创业正成为政策制定者迫切的现实需求。

近年来,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创业活动间关系的研究也正日益增多(Hong等,2021)^[4]。然而,现有研究结论依然莫衷一是。一方面,立足溢出视角的学者强调外商直接投资的示范效应、供应链联系和员工流动将带来正向溢出效应,促进本地创业活动的增加(Acs等,2012^[5];张开迪等,

收稿日期:2022-11-14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动态、复杂制度环境下的创业活动研究”(7187219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中国国家族企业的组织韧性与长期导向研究——基于制度逻辑与双融管理视角”(72272090);汕头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多元制度与创业活动的关系研究”(STF22027)。

作者简介:王博,男,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制度与创新创业、家族企业,电子邮箱:bwang1993@stu.edu.cn;朱沆,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创业、战略与家族企业,电子邮箱:mnszh@mail.sysu.edu.cn。通讯作者:朱沆。

2018^[6])。另一方面,从竞争视角出发的学者则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竞争加剧会对东道国创业活动表现出显著的挤压效应(Goel, 2018^[7];王戴黎, 2014^[8]),且这种负向效应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尤为明显(Danakol等, 2017^[9])。虽然部分学者试图借助制度情境调合两种观点,但相关研究依然存在冲突。如Kim和Li(2014)^[10]强调外商直接投资是对制度缺失的替代,将在制度薄弱地区表现出更强的创业促进作用;而Slesman等(2021)^[11]则发现,仅当制度完善时,外商直接投资会表现出对东道国创业活动的积极效应。

本文认为,现有研究无法打破僵局、解决矛盾结论问题的一个关键原因是缺乏对创业类型的区分。此前的文献基本都着眼于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整体创业活动的影响,却未区分它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潜在影响机制的差异。由于不同类型创业活动在机会来源和性质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Alvarez和Barney, 2007)^[12],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既存在多种不同的正向溢出机制,也存在正向溢出和负向竞争机制的复杂交织(Spencer, 2008)^[13],这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可能在作用方向和程度上存在根本不同。因此,引入这种区分,有机会将现有研究的争议结论有效整合起来。

由此出发,本文将创业类型的划分引入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研究,尝试解开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促进创新型创业的关键制度要素。本文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深化了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创业活动间关系的理论认识。尽管这一话题近年来引起了部分学者关注,但已有研究仍不加区分地将不同创业活动混同在一起(Kim和Li, 2014^[10]; Slesman等, 2021^[11]),这无助于既有争论的解决。立足于不同创业活动的机会来源和性质差异(Alvarez和Barney, 2007)^[12],本文强调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内在机制及其制度情境差异,这将有助于统合现有研究发现,为深化该领域研究做出贡献。二是深入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创新型创业的复杂作用机制。本研究识别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创新型创业的两类相互冲突的机制——正向知识溢出机制和负向竞争机制,并明晰了强化或弱化上述两种机制的情境条件。由此清晰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创新型创业的路径,特别是凸显了其作用的高度情境依赖性。三是丰富了新兴经济体发展本土创新创业的认识。以往基于溢出理论的研究强调国家已有大型机构的知识溢出是创新创业机会的关键来源(Kirschning和Matthias, 2023^[14]; Fotopoulos, 2022^[15]),然而,对缺乏禀赋资源的新兴经济体如何激发本土创新创业,仍未形成有效认识(Iftikhar等, 2020)^[16]。本文揭示了作为外来知识的外商直接投资是创新创业涌现的另一重要驱动力,这对于拓展知识溢出理论在全球化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从创新来源角度丰富了创新型创业的讨论。

二、文献回顾

1. 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溢出效应

长期以来,学界围绕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展开了大量研究,强调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溢出效应将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企业创新能力和整体社会生产率。这种溢出效应主要通过四种机制实现(Spencer, 2008^[13]; Meyer和Sinani, 2009^[17]):首先,外商直接投资为东道国企业提供了近距离观察学习的机会,使其可以在经营中效仿先进技术、组织实践和管理策略。其次,外资企业和东道国供应链企业建立的纵向联系为知识传递提供了直接渠道。与外资企业建立贸易关系的供销商不仅从合作中直接受益,也扮演着向东道国其他企业传递知识的中介角色。再次,溢出效应也可以通过员工流动产生。当外资企业前雇员进入本土企业工作时,其技术和管理实践细节将扩散到本土公司。最后,外商直接投资所导致的竞争加剧,也可能迫使东道国企业进行技术、管理革新以应对挑战。当然,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带来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导致供应链产

品供不应求、劳动力市场需求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负向竞争效应。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效应取决于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间的联系强度(杨燮,2019)^[18],及东道国企业吸收溢出和抵御竞争的能力(路江涌,2008)^[19]。

然而,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对在位企业的复杂影响已得到广泛验证,这一逻辑是否适用于分析创业企业进入却存在疑问。一方面,与在位企业相比,创业企业从外商直接投资正向溢出中获益的难度更大。由于缺乏与外资企业建立联系的直接渠道,创业者尤其是缺乏行业经验的新生创业者不太可能成为知识溢出的直接受益者,也缺乏足够的资源进行学习。另一方面,创业企业受到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竞争效应却可能更强。较高的冗余资源赋予了在位企业进行策略性应对的空间,即使竞争激烈,它们也可以采用模仿、跟随型策略进行应对。遗憾的是,这种策略对于资源禀赋较弱的创业企业而言并不可行(Feinberg和Gupta,2009)^[20]。当外商进入提高了市场竞争并提供更多优质就业岗位时,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可能选择进入就业市场获取高额薪酬而排除潜在的创业选项(王戴黎,2014)^[8]。总的来说,现有文献仍不清楚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如何影响创业者对机会的识别和利用,也未理清正反两方面效应叠加下其对创业决策的复杂影响。

2. 模仿型创业与创新型创业

创业是企业家通过发现、评估和利用商品或服务的机会,以获取潜在收益的活动(Shane和Venkataraman,2000)^[21]。以往文献常将创业视为更具创新导向的活动。然而,创新需要大量资源投入,也伴随着较大的困难和风险,现实中大多数创业活动可能仅以非常简单的形式展开(Autio,2007)^[22]。由于考察创业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仅要看创业企业的数量,更应观察创业者利用其创造力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创新程度。因此,关注追求成长与创新的高质量创业活动,其重要性要远大于对创业数量的简单分析。

当考虑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模仿型创业与创新型创业的区分尤其值得重视(Minniti和Levesque,2010^[23];Lafuente等,2020^[24])。其中,模仿型创业是创业者通过模仿、复制现有产品或服务,从而增加市场竞争和产品供应的活动,是创业者利用客观套利机会的理性行为。模仿型创业机会往往来源于外生性市场竞争缺陷(Alvarez和Barney,2007)^[12],即由技术、消费者偏好或其他外部环境变化引起的竞争缺陷,是现有生产函数下仍未被充分开发的市场空间,这些机会往往独立于创业者而客观存在。在这类创业活动中,创业者的任务是对客观机会进行搜索、利用,并对机会进行开发以实现收益最大化。此时,创业者可以通过收集信息,进行创业成本与收益分析,了解与潜在创业机会相关的各种结果与可能性。因此,模仿型创业决策是以风险作为判断决策的依据,而较少存在不确定性(Young等,2018)^[25]。

创新型创业则是创业者向市场中引入新产品或服务,从而带来技术变革和生产率提高的活动(Tang等,2021)^[26],常被描述为创业者的创造性破坏行为。与模仿型创业不同,创新型创业的机会来源于内生性市场竞争缺陷(Alvarez和Barney,2007)^[12],即机会并不一定事先存在于市场中、或与现有市场联系不明显,而是创业者内生性创造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创业者角色的关键在于利用其雄心、创造力和判断力,在行动中不断与外部环境互动迭代,构建新的资源组合方式(Lafuente等,2020)^[24]。由于机会很大程度上是创业者创造出来的,而创业者难以通过行动前的信息收集判断可能结果的概率分布,因此创新型创业是在不确定情境下追求机会的创业行为(Young等,2018)^[25]。

客观而论,两种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都有贡献,均有助于提高整体社会生产率水平,但由于作用方式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效益。其中,模仿型创业机会产生于现有市场不均衡,更多的模仿型创业将有助于提高市场效率,帮助经济体更有效利用资源,在现有生产函数下趋近均衡状态。因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模仿型创业对产品供应和竞争效率的提升也足以促进经济增长(Minniti和

Levesque, 2010)^[23]。而创新型创业则会对现有市场均衡产生创造性破坏,能带来更大的附加值(Bradley 等, 2021)^[27],有助于推动国家技术前沿向上移动。尤其是在急需突破性技术变革时,创业企业可能比在位企业更有动力进行根本性的革新行为。因此,创新型创业也被视为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三、假设提出

1.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创业活动

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机制存在内在差异(如表 1 所示)。一方面,由于模仿型创业是基于客观套利机会的风险决策,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增加市场需求,改变东道国现有市场均衡,使潜在创业者得以通过对产品的复制或简单模仿获取利润(市场溢出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创新型创业是基于内生创造机会的不确定性决策,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增加社会整体知识存量和知识多元性,促进潜在创业者对新知识的探索和整合,以形成创新机会(知识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在人才、市场、资源等方面的直接竞争,创新型创业也是外商直接投资负面效应的主要受损者(竞争效应)。这种内在机制差异将使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创业活动产生不同影响,并在东道国不同正式制度水平下进一步凸显。

表 1 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型创业、创新型创业

比较项目	模仿型创业	创新型创业
机会来源	客观存在,待发现	创业者的内生性创造
创业性质	风险决策	不确定性决策
外商直接投资与机会来源	对市场溢出的直接利用	利用知识溢出的创造性建构
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竞争关系	较弱	较强,人才、市场、资源竞争
外商直接投资与创业决策	减少创业风险	增加创业不确定性

(1)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型创业。市场溢出效应指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或更高质量的投入,将产生更多的产品和服务需求,进而在东道国产生新的商业机会,促进更多本土创业,部分学者也称为需求创造效应(Kim 和 Li, 2014^[10]; Ayyagari 和 Kosová, 2010^[28])。首先,市场溢出效应的直接表现是供应链纵向溢出,即通过供应链后向和前向联系产生(Kim 和 Li, 2014)^[10]。其中,后向联系指与东道国上游企业的采购关系。由于东道国政府往往会要求外资企业进行一定份额的本地采购,而本地企业也能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原材料或零部件,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将扩大上游市场需求规模(Mei, 2021)^[29],刺激创业进入以填补市场缺失。前向联系则指与下游企业的产销关系。相比外来者,本地企业家在社会嵌入和关系网络方面更具优势,外资企业往往需要与他们展开各类型的合作(如构建经销网络)以快速拓展市场。同时,外资企业高质量的产品供应也将有助于提高下游行业的产品质量,并反过来刺激其潜在产品需求,吸引创业进入(Ayyagari 和 Kosová, 2010)^[28]。

其次,市场溢出效应也表现在行业横向溢出之中。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新产品构建了新的市场需求,也为国内创业者模仿其产品创造了细分市场机会。尤其是外资企业往往倾向于在高端市场中销售现有产品,却忽视了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广阔“金字塔底层”潜在市场。此时,本地创业者可以通过对新产品进行简单模仿,以开发未被利用的细分市场。此外,外商直接投资也带来了渗透海外市场所需的知识,当本地企业家发现出口市场机会时,可进一步刺激国内企业的创建(田毕飞等, 2018)^[30]。因此,外资企业进入往往将产生“头雁效应”,引导本地创业活动的产生并形成产业聚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涌现为这一效应提供了最生动的范例。与外资企业专注于城市高端客户群体不同,众多本土创业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产品的简单模

仿,抢占乡镇下沉市场和出口市场。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大规模引进我国香港地区服装、纺织等轻工制造业后,东莞本地乡镇企业数在20世纪90年代前五年间迅速增加了4000多家^①。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外商直接投资会提高东道国模仿型创业率。

(2)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型创业。尽管市场溢出效应带来了更多市场需求,但对现有产品的复制或简单模仿并无助于创新机会的产生。对于创新型创业,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知识溢出产生促进作用。由于存在外来劣势,进入发展中国家时,外资企业必须依赖其特殊优势——通常是基于知识的无形资产进行竞争(Saliola和Zanfei,2009)^[31]。有别于其他资源,知识具备非排他性和不可耗竭性,知识所有者很难阻止他人对同样知识的应用。因此,当外资企业运用其优势在东道国进行竞争时,技术和其他无形资产将不可避免地通过知识溢出转移到东道国企业之中。这种无形的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供应链联系和员工流动产生(Spencer,2008)^[13]。一方面,由于提高供应链质量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外资企业在对本地供应商提出严苛标准时,往往也会对其进行积极的知识培训和技术辅导,甚至充当合作企业与国外先进知识间的沟通桥梁^②。这种知识传递过程不仅有助于提高上游产品的质量,也使东道国供应链中的所有其他企业受益(Clark等,2011)^[32]。另一方面,当外资企业的前雇员转移到其他本地公司或创办自己的企业时,高级技术、技能和专门知识也将不可避免地扩散开来(Fu,2012)^[33]。

根据创业的知识溢出理论,新知识构成了创新创业机会的基本来源(Stenholm等,2013^[34];Acs等,2009^[35])。尽管新知识是外资企业研发的产物,而东道国现有企业则是知识溢出的直接受益者,但受限于战略刚性或风险规避认知约束,在位企业往往无法将新知识充分商业化。当潜在创业者意识到新知识未被充分利用时,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探索新知识与市场的联系,以构建新机会。此时,创新型创业被视为联结新知识与商业化市场的关键渠道,是创业者对新知识的内生性反应(Acs等,2009)^[35]。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知识多元性也是创新型创业机会产生的重要来源(Zhang等,2010)^[36],这既体现在技术、产品和管理实践之上,也体现为多样化的文化和商业模式。基于知识的机会创造通常是将新知识整合到现有知识网络,或以新方式重组现有知识的过程(Kneeland等,2020)^[37]。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更为多元的新知识,潜在创业者利用新知识,或对多元知识进行重新组合以实现创新的空间随之扩大。尽管这种知识溢出机制难以直接观察,但Acs等(2012)^[5]研究发现,有33%的本地知识型创业企业是由外资企业离职员工创建的。

然而,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也存在由于竞争所引起的负向效应。有别于现有文献,本文认为,创新型创业将是外商直接投资负向竞争效应的主要受损者,这体现在人才竞争、市场竞争、资源竞争等方面。

首先,外资企业通常会提供比国内企业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资,这将直接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创业机会成本,不仅减少了其冒险开展创新型创业的可能性,也提高了潜在创业者吸引创新型人才的难度(许和连等,2009)^[38]。例如,王戴黎(2014)^[8]研究发现,相较于其他个体,较高的薪酬将导致具备外资企业工作经验的个体创业概率降低近50%。其次,有别于模仿型创业往往聚焦于下沉市场而不会与外资企业产生直接竞争(Spencer,2008)^[13],创新型创业企业则更可能与外资企业在同一细分市场展开竞争(张开迪等,2018)^[6]。由于外资企业具备更强的市场合法性和品牌优势,存在新生劣势的本土创新型创业会遭遇强大的竞争压力。此外,外

① 详细数据和分析参见:苏斌.外商投资与东莞的经济发展[J].广州:珠江经济,2005,(7):40-49。

② 如大众1984年与上海一汽签订合资协议后,积极采用各种方式促进本地供应商的学习和发展。这种知识协同使得符合大众质量标准的本地供应商从1986年的两家,逐步增加到1997年的248家。

资企业往往能同时利用母国和东道国两个市场获取规模优势,其与上下游供应链的谈判实力更强,不仅能低成本获取原材料,还能限制高质量原材料向本土企业的供应,这使得缺少用户信任基础的创新型创业在与它们竞争资源时不得不付出更高成本。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假设:

H_{2a}:外商直接投资会提高东道国创新型创业率。

H_{2b}:外商直接投资会降低东道国创新型创业率。

(3)正式制度水平的调节作用。东道国正式制度发展水平是影响外商直接投资作用的关键情境(Kim和Li,2014^[10];Slesman等,2021^[11])。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正式制度的共同作用,进一步明晰上文逻辑链条并调和前人研究争论(贾良定等,2017)^[39]。借鉴Webb等(2020)^[40]的观点,将正式制度界定为约束、激励和支持合法行为的规则和要素,其中不仅包括正式法律、规则、条例等,也包括资本、劳动力市场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等支持要素。本文认为,正式制度将对两类创业活动产生不同的调节作用。

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将在正式制度不完美的国家对模仿型创业表现出更强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市场溢出既带来了稳定的市场需求,也为创业者模仿外资企业新产品提供了渠道。通过示范效应,本地创业者可以观察外资企业新产品的成功和失败经验,不仅减少了创业企业的市场开发成本,也提高了潜在机会的可预测性,大大减少了创业失败的风险。因此,在正式制度发育不完美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产生新的模仿机会,还间接保障了模仿它们产品的创业企业能有利可图地利用机会(Kim和Li,2014)^[10]。同时,正式制度的缺位也意味着外资企业应对“山寨式”模仿的成本较高,它们更可能在模仿者对其主导市场侵蚀较少的情况下选择不采取制约行动。与之相反,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及其所伴随市场竞争的加剧,潜在创业进行简单模仿获利的可能性将降低。

另一方面,对于创新型创业,外商直接投资则会在正式制度发育水平不同的国家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尽管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能够激发创新机会的创造,但知识整合的难度及其所伴随的高度竞争也将增加创新型创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导致更高的进入壁垒和灵活性需求(Audretsch和Belitski,2021)^[41]。在制度不完善环境下,创业者既难以获取可靠的创新收益保障,也难以获取充分的外部支持,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将主要表现出负面挤出效应。与之相反,完善的正式制度则能减少对创业者的管约束,允许更灵活的雇员和融资活动,进而减少不确定性影响、赋予创新型创业者更大的试错空间(Young等,2018)^[25]。此时,潜在创业者利用知识溢出进行创新型创业行为的可能性将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正效应加强并占据主导。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_{3a}:东道国正式制度发展水平调节外商直接投资对模仿型创业率的作用,正式制度发育不完善时,外商直接投资对模仿型创业率的促进效应更强。

H_{3b}:东道国正式制度发展水平调节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型创业率的作用,正式制度发育不完善时,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型创业率呈现负效应;而正式制度发育完善时,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型创业率表现出促进效应。

2.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型创业:进一步机制解析

考虑创新型创业对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发挥着更关键作用,因此,在上述讨论基础上,有必要围绕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型创业间的复杂机制进行深入解析,并明晰有效促进创新型创业的具体制度,这将有助于为新时期更好地利用外资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具体而言,对于创新型创业,外商直接投资最终表现出积极效应还是消极效应,取决于制度环境决定下东道国创业企业吸收、利用知识溢出的能力和意愿,及其抵御潜在竞争的能力(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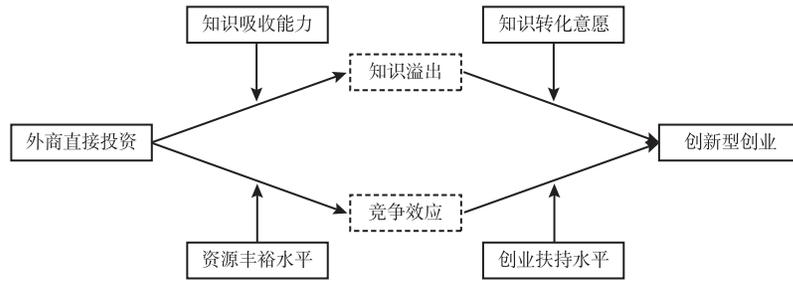


图1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创新创业的理论模型

注:虚线方框表示潜在作用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1)知识溢出机制及其情境条件。尽管发展中国家与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决定了知识溢出的潜力,但这种知识溢出并不会自动导致创新创业的产生,其效应将取决于东道国创业者的知识吸收能力和知识转化意愿(Meyer和Sinani,2009)^[17]。

首先,知识吸收能力是知识接收者能否有效识别新知识价值,并对其进行吸收、利用的能力,决定了东道国创业者获取知识溢出的程度(Kirschning和Matthias,2023)^[14]。在知识吸收能力较弱的国家,即使外商直接投资带来了更先进、多元的新知识,但受自身知识储备限制,本地创业者也可能难以认识到新知识的价值。相反,更强的吸收能力则将赋予东道国创业者更好利用知识溢出的能力,有助于他们更好吸收外部新知识并与现有知识进行整合以实现创新(Jin等,2018)^[42]。在国家层面上,知识吸收能力源于一国的知识储备,Stenholm等(2013)^[34]便将一国已有知识视为影响创新创业的关键“促进性”(conducive)制度,将为创新的引入和传播提供重要基础环境。此外,国家知识储备越强,外资企业也越可能将高技术部门配置于该地区,以便将技术任务和高质量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给本地公司,形成更好的知识协同(Castellani等,2022)^[43]。由于知识吸收能力通常取决于东道国已有劳动力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本文采用国家研发投入水平进行衡量(Meyer和Sinani,2009)^[17]。

其次,知识转化意愿是潜在创业者利用知识溢出实施创新创业行为的意愿。这种意愿通常取决于国家产权保护制度下,创业者对潜在机会利润分配可得性的判断(Autio和Acs,2010)^[44]。有别于模仿型创业更多涉及物质资本,创新创业则更可能涉及不易保护的知识产权。对于这类创业者,缺乏明确的产权保护意味着创新收益将更易受到既得利益者的盘剥和模仿者的侵害,导致创业活动的预期回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Zhou,2018)^[45]。此时,高技能劳动者将更可能选择其他途径利用其知识创新,如进入外资企业或现有大型企业以寻求内部制度保护。而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则将提高个人利用知识溢出进行创新创业活动的可能性(Yi和Alireza,2017)^[46]。正如Rodrik(2000)^[47]所指出的,除非创业者对创造的资产回报有足够的控制,否则他们没有财富积累和创新的动力。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₁:随着东道国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创业率的促进效应增强。

H₂:随着东道国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创业率的促进效应增强。

(2)竞争效应及其情境条件。尽管创新创业是外商直接投资竞争效应的主要受损者,但东道国的资源丰裕水平将决定潜在创业者受竞争挤出的影响强弱,而东道国的创业扶持水平则保证了潜在创业者即使在激烈竞争环境下,也得以获取稳定的资源支持。

首先,资源丰裕水平决定了东道国创业者受外商直接投资竞争影响的程度。现有研究表明,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可能是影响创业者资源获取的最关键制度因素(Chowdhury等,2019)^[48]。金融发展水平从宏观上影响东道国私营经济活力,在微观上则决定了创业者获取外部金融支持以克服

进入壁垒、财务约束的可能性。尽管创业者可以通过个人非正式关系网络(如朋友、家人、同学等)获取部分财务资源支持,但落后的金融发展水平将导致他们在获取更多金融资源时面临额外的困难,其制约作用对旨在谋求高成长的创新型创业而言尤为明显(Young等,2018)^[25]。由于外资企业比创业企业具备更多的合法性,因此在金融资源受限的国家,外资企业进入将极大挤压东道国创新型创业获取外部资源支持的空间(Jude,2019)^[49]。而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外资企业和本地成熟企业难以吸纳全部金融资本,一些金融资源将转而投向回报率较高的创新型创业项目,此时外商直接投资引起的竞争效应减弱。

其次,创业扶持水平则决定了高度竞争环境下创业者所能获得资源支持的程度。由于创新的回报不确定性,且创业者难以在短期内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和信任机制,创业企业通常受制于市场选择偏见而难以获得足够的资源支持(Chang和Wu,2014)^[50],这种新生劣势将在外商直接投资引发的激烈竞争中被进一步放大。因此,世界各国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创业扶持项目以保护创业企业免受市场竞争的威胁,例如提供创业场所、减免税收和租金、提供小额信贷帮扶、协助市场推广等。有别于市场竞争机制,政府扶持将为创业企业提供一种缓冲机制,使其即使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也能获取稳定的资源支持(Chowdhury等,2019)^[48]。同时,取得政府扶持也可提高创业企业的合法性,并反过来增加其获取其他外部支持的可能性(Stevenson等,2021)^[51]。因此,创业扶持水平越高,东道国创业者将越可能在外商直接投资激烈竞争下开展创新型创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 H₆:随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型创业率的促进效应增强。
- H₇:随着东道国创业扶持水平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型创业率的促进效应增强。

四、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匹配多源数据构建国家层面样本,基于全球创业观察(GEM)获取国家创业数据,基于世界发展指数(WDI)、世界经济自由指数(IEF)、GEM国家创业环境指数(GEM NECI)获取其他国家层面数据。有别于单一国家内部比较,国别样本能提供更广泛的组间差异,而GEM数据库也将为衡量不同类型创业活动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同时,由于本文重点观察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特别是其带来的先进知识对东道国创业者的影响,因此选取发展中国家样本进行检验^①。最终,构建了2010—2018年59个国家共268个国家-年份观测值的检验样本^②。

研究方法方面,考虑到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存在历史路径依赖,因此根据Hoechle(2007)^[52]的建议,本文采用带D-K标准误的OLS方法进行回归分析以避免潜在的截面相关和序列相关问题。

2. 变量测量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熊彼特认为,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进行新组合、利用新发明以替代现有产品的过程。与这一观点类似,本文将创新型创业界定为创业者向市场引入新产品或服务的活动。在变量测量上,借鉴Yoon等(2018)^[53],基于GEM题项“潜在客户是否认为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新的或不熟悉的”对创业类型进行识别。若创业企业创建了一个新市场,即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至少是部分客户不熟悉的,则界定为创新型创业;反之,若全部潜在客户熟悉创业企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则界定为模仿型创业。基于这一界定,进一步构建国家层面创业活跃率。其中,模仿型

①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界定进行国别选取。

② 当前GEM最新公布数据为2019年,但由于GEM在2019年调查中更改了相关指标测量方式,同时为规避金融危机影响,选取2010—2018年数据进行检验。

创业率指模仿型创业数量占国家受访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创新型创业率指创新型创业数量占国家受访劳动力人口的比例(%)。

(2)解释变量。与现有文献一致(Slesman等,2021^[11];Berrill等,2020^[54]),采用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净值与国家GDP之比(%)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为WDI。考虑到溢出效应的时间滞后,同时为避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对解释变量进行滞后一年处理。

(3)调节变量。①正式制度水平:根据国别-年份世界经济自由指数IEF进行赋值。IEF指标由法治、政府规模、监管效率和市场开放度四个项目、包含十个子指标综合测算而得,是经济管理领域衡量国别正式制度发展水平的最常见指标。②研发投入水平:采用国家年度研发投入费用与GDP之比(%)进行衡量,数据来源为WDI。③产权保护水平:借鉴Autio和Acs(2010)^[44],采用IEF中的产权保护指标进行衡量,旨在体现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保护私有产权、尊重知识产权,以及保护公民私有财产免受侵害。④金融发展水平:借鉴Osei和Kim(2020)^[55],采用国家金融部门向国内私营经济提供的信贷与GDP之比(%)进行衡量,该指标能有效体现潜在创业者获取外部金融支持的难易程度和数量差异,数据来源为WDI。⑤创业扶持水平:通过对GEM国家创业环境指数中的“税收与官僚”和“政府计划”指标取均值而得,前者旨在衡量国家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创业活动,后者旨在衡量国家及其各级政府直接扶持中小企业项目的数量和质量。

(4)控制变量。对可能影响创业的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进行控制(Kim和Li,2014^[10];Slesman等,2021^[11]),包括:人均GDP、GDP增长率、人口总数、人口密度、失业率、基础设施、创业教育、创业文化。其中,基础设施、创业教育和创业文化的数据来源为GEM NECI,其余变量的数据来源为WDI。此外,对样本国家所在地区(洲)、年份进行虚拟变量控制。

具体变量定义与测量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定义与测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测量
被解释变量	模仿型创业率	<i>Imitation</i>	模仿型创业数量占国家受访劳动力人口的比例(%)
	创新型创业率	<i>Innovation</i>	创新型创业数量占国家受访劳动力人口的比例(%)
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	<i>IFDI</i>	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净值与国家GDP之比(%),滞后一年
调节变量	正式制度水平	<i>Inst</i>	国别-年份世界经济自由指数
	研发投入水平	<i>R&D</i>	国家年度研发投入费用与GDP之比(%)
	产权保护水平	<i>Property</i>	世界经济自由指数中的产权保护指标
	金融发展水平	<i>Finan</i>	国家金融部门向国内私营经济提供的信贷与GDP之比(%)
	创业扶持水平	<i>Support</i>	根据GEM NECI中“税收与官僚”和“政府计划”指标取均值而得
控制变量	人均GDP	<i>GDP_per</i>	国家人均GDP,取对数
	GDP增长率	<i>GDP_growth</i>	国家人均GDP增长率(%)
	人口总数	<i>Pop_all</i>	国家人口总数,取对数
	人口密度	<i>Pop_density</i>	国家每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取对数
	失业率	<i>Unemp</i>	国家失业人数与劳动人口之比(%)
	基础设施	<i>Infra</i>	根据GEM NECI中“商业和专业基础设施”指标进行赋值
	创业教育	<i>Ent_edu</i>	根据GEM NECI中校内、校外“创业教育与培训”指标取均值而得
	创业文化	<i>Culture</i>	根据GEM NECI中“文化和社会规范”指标进行赋值

五、实证检验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列示了本文模型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其中,*Imitation*的均值为9.03,*Innovation*

的均值为 6.87,即模仿型创业率与创新型创业率的比值大约为 1.31:1。同时,不同国家间创业率、外商直接投资、制度要素水平也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在相关性方面, *Imitation* 与 *IFDI* 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 *Inst* 表现出显著负相关关系;而 *Innovation* 则与 *IFDI*、*Inst* 均显著正相关^①。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Imitation</i>	268	9.0343	6.5552	1.9278	33.7390
<i>Innovation</i>	268	6.8701	5.0418	0.2030	23.8818
<i>IFDI</i>	268	3.4487	3.3470	0.0567	37.2725
<i>Inst</i>	268	61.2384	8.0724	37.6000	79.0000
<i>R&D</i>	195	0.6052	0.4569	0.0222	2.1857
<i>Property</i>	268	42.9093	18.4065	5.0000	90.0000
<i>Finan</i>	268	59.1029	37.7353	10.6047	157.8121
<i>Support</i>	268	2.3710	0.3971	1.4900	3.5450
<i>GDP_per</i>	268	8.7990	0.7933	6.4821	11.0230
<i>GDP_growth</i>	268	3.6396	2.7683	-7.4446	13.3962
<i>Pop_all</i>	268	17.1110	1.7474	12.3725	21.0545
<i>Pop_density</i>	268	4.1731	1.0968	1.2551	7.0447
<i>Unemp</i>	268	7.7441	5.8534	0.1400	28.0100
<i>Infra</i>	268	2.8621	0.2927	1.7500	3.6400
<i>Ent_edu</i>	268	2.3825	0.3450	1.4950	3.4450
<i>Culture</i>	268	2.8325	0.4363	1.6200	4.0600

2. 回归结果分析

表 4 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模仿型、创新型创业率的关系检验结果。模型 2 的结果表明,对于模仿型创业率, *IFDI* 的系数显著为正 ($\beta=0.1417, p<0.01$), 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东道国模仿型创业率, 支持了假设 H_1 。而模型 5 的结果则显示, 对于创新型创业率, *IFDI* 的系数表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beta=0.0431, p>0.1$), 且这一正相关关系在后续模型中并不稳健。

模型 3 和模型 6 为正式制度的调节效应, 结果表明, 对于模仿型创业率, *IFDI*×*Inst* 的系数显著为负 ($\beta=-0.0278, p<0.1$)。而对于创新型创业率, *IFDI*×*Inst* 的系数显著为正 ($\beta=0.0417, p<0.05$)。为直观呈现检验结果, 图 2 列示了 *IFDI* 的真实边际效应, 可见, *IFDI* 能有效提高东道国模仿型创业率, 且在正式制度薄弱国家作用更明显。与之相反, 仅当正式制度较完善时, *IFDI* 会表现出对创新型创业的促进作用。而在正式制度发育不完善国家, *IFDI* 表现出对东道国创新型创业明显的抑制作用。这也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创新型创业是外商直接投资竞争效应主要受损者的理论观点。以上, 假设 H_{3a} 和假设 H_{3b} 得到支持。

表 4 外商直接投资与创业类型: 直接效应和正式制度的调节

变量	<i>Imitation</i>			<i>Innovation</i>		
	(1)	(2)	(3)	(4)	(5)	(6)
<i>IFDI</i>		0.1417*** (0.0293)	0.2571*** (0.0721)		0.0431 (0.0344)	-0.1298 (0.0737)

① 限于篇幅, 相关性分析未列示, 备索。

续表 4

变量	Imitation			Innovation		
	(1)	(2)	(3)	(4)	(5)	(6)
$IFDI \times Inst$			-0.0278* (0.0139)			0.0417** (0.0165)
$Inst$	-0.0962** (0.0403)	-0.1092** (0.0403)	-0.3443** (0.1470)	0.1820*** (0.0276)	0.1780*** (0.0260)	0.5303*** (0.1503)
GDP_per	-2.9149*** (0.2752)	-2.8744*** (0.2987)	-2.8627*** (0.3142)	-1.0712*** (0.3125)	-1.0589*** (0.3011)	-1.0764*** (0.3184)
GDP_growth	-0.2303** (0.0897)	-0.2536** (0.0904)	-0.2611** (0.0867)	0.1301* (0.0690)	0.1230* (0.0657)	0.1342 (0.0930)
Pop_all	-1.0057*** (0.1760)	-0.9159*** (0.1497)	-0.8937*** (0.1516)	0.2138 (0.1611)	0.2411 (0.1720)	0.2078 (0.1418)
$Pop_density$	-0.3154 (0.4361)	-0.2910 (0.4376)	-0.3207 (0.4601)	-0.0584 (0.2900)	-0.0510 (0.2843)	-0.0064 (0.3035)
$Unemp$	-0.3525*** (0.0548)	-0.3544*** (0.0491)	-0.3371*** (0.0511)	-0.0661* (0.0297)	-0.0667* (0.0302)	-0.0926** (0.0310)
$Infra$	-5.3447*** (0.9467)	-5.3811*** (0.9225)	-5.4484*** (1.0114)	-3.8052*** (0.8560)	-3.8163*** (0.8339)	-3.7154*** (0.8910)
Ent_edu	2.2708* (1.0826)	2.5349* (1.1206)	2.4340* (1.2334)	1.9443*** (0.5165)	2.0246*** (0.5507)	2.1758** (0.6509)
$Culture$	0.6717 (0.4700)	0.4386 (0.4312)	0.4499 (0.4256)	2.0139*** (0.4576)	1.9430*** (0.4638)	1.9261*** (0.4562)
地区/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68	268	268	268	268	268
常数项	64.9399*** (4.0050)	62.4717*** (3.6673)	62.5239*** (3.5791)	15.8387** (5.5823)	15.0883** (5.3894)	15.0102** (4.8869)
调整 R ²	0.4259	0.4278	0.4321	0.3405	0.3385	0.3609

注：*、**、***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Driscoll-Kraay 标准误，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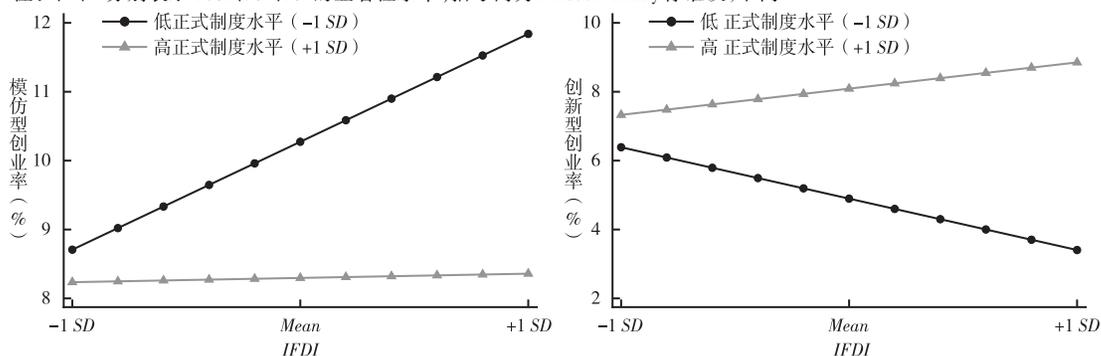


图 2 外商直接投资与模仿型创业率、创新型创业率：正式制度的情境作用

表 5 和表 6 为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创新型创业的制度调节机制检验结果。假设 H₄ 提出，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型创业的促进作用会随东道国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然而，预期假设并未得到支持。模型 7 表明， $IFDI \times R\&D$ 呈现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beta = -0.1842, p > 0.1$)。这可能是由于研发投入水平不仅决定了东道国的知识吸收能力，也将影响其从知识溢出中受益的潜力。当东道国

研发水平较高时,尽管其对知识溢出的吸收能力较强,但其自身知识水平与外资企业间的差异并不大,这将限制溢出的积极效应(Boly等,2015)^[56]。如Zhang等(2010)^[36]曾发现,当外资企业与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差距处于中间水平时,知识溢出效应最强;而随着东道国企业技术能力的上升,知识溢出将难以产生新的价值。

模型9是对这一潜在非线性关系进行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在对 $R\&D^2$ 进行控制后, $IFDI \times R\&D$ 的系数显著为正($\beta=2.1284, p<0.05$),而 $IFDI \times R\&D^2$ 的系数显著为负($\beta=-1.6377, p<0.01$)。由图3可见,随着国家研发投入的增加, $IFDI$ 对东道国创新创业率的边际效应将逐步增加。然而,当国家研发投入达到一定阈值时, $IFDI$ 对创新创业率的促进效应将逐步降低,即呈现“倒U型”调节关系。换言之,当国家研发投入处于中等水平时,外商直接投资对创新创业的促进作用最强。

表5 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创业率:研发投入的情境作用

变量	Innovation		
	(7)	(8)	(9)
<i>IFDI</i>	0.0421 (0.1694)	0.0519 (0.1452)	-0.0172 (0.1376)
<i>R&D</i>	-4.4638 (3.0085)	-7.3785*** (1.6417)	11.8223** (5.0862)
<i>IFDI × R&D</i>	-0.1824 (0.4126)	-0.0091 (0.3595)	2.1284** (0.6688)
<i>R&D²</i>		2.1304** (0.7119)	-12.6846** (4.2842)
<i>IFDI × R&D²</i>			-1.6377*** (0.479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年份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5	195	195
常数项	-12.5799 (7.5543)	-18.5813* (8.9471)	-19.4343* (9.1940)
调整 R ²	0.3718	0.3820	0.39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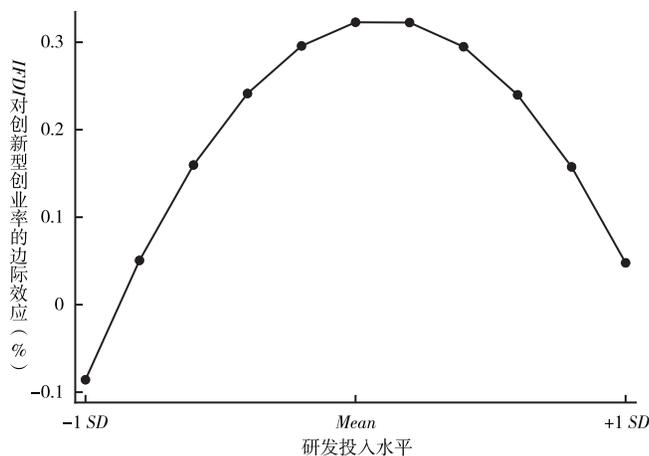


图3 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创业率:研发投入的情境作用

表 6 是对假设 H₅、假设 H₆ 和假设 H₇ 进行检验的结果,结果表明,产权保护、金融发展、创业扶持水平与 *IFDI* 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 ($\beta=0.0152, p<0.01; \beta=0.0109, p<0.01; \beta=0.7017, p<0.01$),且在后续整体模型检验中保持稳健。由图 4~图 6 可见,随着国家产权保护、金融发展、创业扶持水平的提高, *IFDI* 表现出对创新创业的积极作用,而在相关制度禀赋较弱的国家, *IFDI* 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综上,假设 H₅、假设 H₆ 和假设 H₇ 均得到支持。

表 6 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型创业率:产权保护、金融发展与创业扶持的情境作用

变量	Innovation			
	(10)	(11)	(12)	(13)
<i>IFDI</i>	-0.0116 (0.0868)	-0.0803 (0.0594)	-0.0541 (0.0411)	-0.1546 (0.0945)
<i>Property</i>	0.0637* (0.0310)			0.0348 (0.0102)
<i>IFDI</i> × <i>Property</i>	0.0152*** (0.0040)			0.0102*** (0.0028)
<i>Finan</i>		0.1218*** (0.0202)		0.1031*** (0.0226)
<i>IFDI</i> × <i>Finan</i>		0.0109*** (0.0023)		0.0087*** (0.0020)
<i>Support</i>			5.2822** (2.1289)	2.8320* (1.3872)
<i>IFDI</i> × <i>Support</i>			0.7017*** (0.1531)	0.4822*** (0.108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年份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68	268	268	268
常数项	10.5517** (3.7740)	23.9053*** (5.1335)	11.5195** (4.4323)	16.0256*** (3.4503)
调整 R ²	0.3659	0.4001	0.3598	0.42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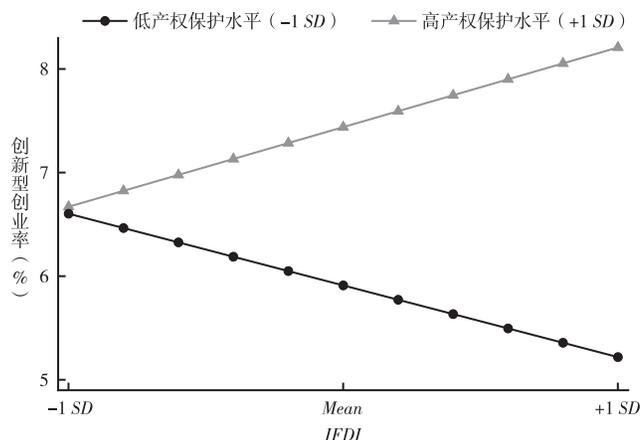


图 4 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型创业率:产权保护的情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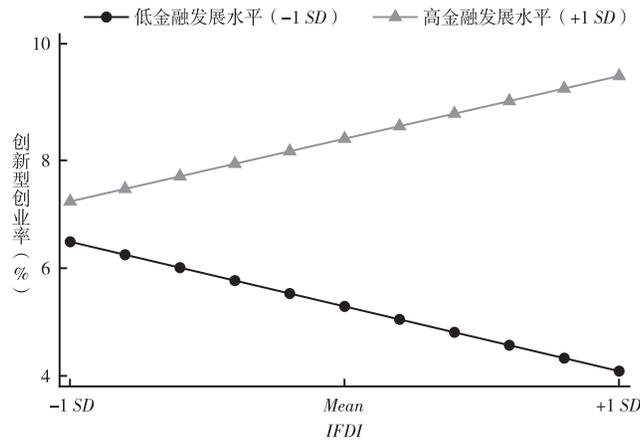


图5 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型创业率:金融发展的情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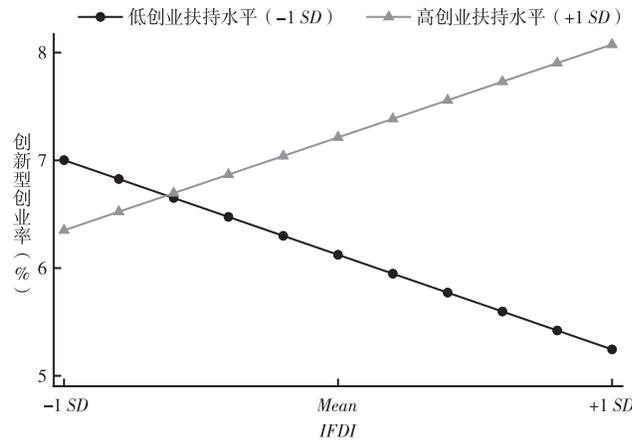


图6 外商直接投资与创新型创业率:创业扶持的情境作用

3.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更改时间序列、变量测量、样本选择等多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

(1)更改时间序列。考虑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时间滞后,同时,为进一步规避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滞后2~5年的IFDI数据进行再检验。结果表明,尽管滞后IFDI的直接效应表现不稳定,但其与相关制度变量的交互项检验结果与上文高度一致,仍呈现出明显的制度依赖性,支持了本文研究假设。

(2)变量测量的替代检验。①借鉴Lee等(2011)^[57],为避免数据偏态分布的影响,对解释变量IFDI取对数进行再检验;②借鉴Fredström等(2021)^[58],将创新型创业率除以模仿型创业率的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再检验。与前文指标相比,这一指标能有效衡量社会整体创业活动的创新性水平;③借鉴Stephan和Uhlaner(2010)^[59],采用产品客户熟悉度及市场竞争水平对创业类型进行界定:若客户对产品不熟悉,且市场中很少或没有企业提供相同产品,则界定为创新型创业,反之为模仿型创业。基于此构建国家层面创业变量进行再检验;④使用经济自由指数(EFW)对正式制度进行替代检验;⑤对所有控制变量滞后一年进行再检验;⑥为避免极端异常值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分位的缩尾替换处理;⑦在上文模型7~模型13中,对整体正式制度进行控制以识别细分制度净效应,为避免潜在共线性问题影响,在不控制正式制度指标的情况下进行再检验。以上结果均与上文高度一致。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备索。

(3)样本选择的替代检验。①为扩大样本量,选取2008—2018年样本进行再检验。②由于外国资金可能由于避税动机而发生流入现象,而这种投资并不会导致溢出效应的产生。因此,基于IMF和Dharmapala和Hines(2009)^[60]的界定,删除离岸金融中心国家进行再检验。③作为衡量国家知识吸收能力的关键指标,研发投入水平在样本中存在较大缺失,占整体样本的27%。通过观察数据可以发现,导致缺失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大量研发投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会选择不公布这一数据。因此,为避免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上文分析中并未保持所有模型样本一致。为保证结论稳健性,本文也采用删除研发投入缺失值的样本对其他模型进行再检验。④同时,本文也使用线性插值法、以及10%、20%、30%、40%和50%分位数对研发投入缺失值进行替换。以上结果均与上文高度一致。

六、结论与讨论

1. 研究结论

本文从创业角度切入,探索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不同类型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在直接效应上,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提高东道国模仿型创业率,而对创新型创业率的作用并不显著。其次,东道国正式制度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创业活动的关键情境。对于模仿型创业,外商直接投资将在正式制度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表现出更强促进作用。而对于创新型创业,外商直接投资则在正式制度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表现出促进作用,在制度落后国家表现出抑制作用。最后,创新型创业既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知识溢出,也是外商直接投资负向竞争效应的主要受损者,哪种效应占据主导并表现出来,取决于正式制度决定的东道国企业家吸收、利用知识溢出的能力和意愿,及其抵御潜在竞争的能力。当国家研发投入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产权保护、金融发展、创业扶持水平较高时,外商直接投资将表现出对东道国创新型创业明显的促进作用。

2. 实践启示

第一,本文有力揭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市场发展在不同阶段中的动态演变关系。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在不同发展阶段,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市场发展间的关系将逐步经历从以开放促改革到以改革促开放的关系转变。一方面,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发展较不完善,市场化制度建设也仍处于探索过程。此时,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带来了更高的供应链产品需求,也为国内创业者开发市场潜力提供了指引,有助于降低创业风险并弥补薄弱环境的限制。在这一阶段,通过模仿外资产品、抢占外资企业忽视的下沉市场和细分市场,大量国内创业企业得以蓬勃发展,在提高资源分配效率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内市场均衡的构建。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发展和制度建设的完善,创新型创业既受益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也受其潜在竞争的挤压。此时,本地要素禀赋和制度建设的完善将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创新创业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对这一关系的认识,将为新时期下政策决策者转变思路以更好利用外资提供启示。

第二,坚持“以我为主”的制度建设是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创新型创业的关键。一方面,尽管外商直接投资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了东道国整体知识存量和知识多元性,但知识溢出不会自动产生也不必然会引发更高的创业水平,关键在于东道国的知识水平与吸收能力。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强度持续增加,政府应更加重视构建产学研与个体创业者间的互动机制、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这将有助于强化潜在创业者自身知识储备,提高其识别、吸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新知识,以及对多元知识进行整合创新的可能。同时,也需要更完善的产权制度保障以降低机会不确定性对潜在创业者知识利用意愿的抑制。另一方面,针对创新型创业资源需求大、创新程度

高等特点,应考虑进一步完善普惠小微金融服务和技术创新借贷机制,这将有效降低创业企业的借贷成本并确保更高的融资可得性。同时,各级政府可在资源分配和扶持政策上加大对创新型创业企业的帮扶力度,如提供研发税收抵免、减免租金、协助市场推广等,这有助于鼓励更多个体将创新想法应用于创业实践之中。此外,由于知识吸收、转化是个长期过程,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土创新创业的影响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存在。因此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以自身制度禀赋建设为表征的“以我为主”思路需要长期坚持。

第三,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更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提供支持。由庞大人口数量、国土面积,以及多样化产业结构、市场需求构成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利用好外商直接投资的有利条件。良好的产业基础提供了较强的吸收能力,丰富的市场结构提供了多样化的市场空间,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本土创新创业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条件。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斯拉在上海建立工厂后,与江浙地区汽车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激发了国内电动和智能汽车领域的创业和投资热潮,在政策扶持之下,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新兴的优势产业。因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和评价不应局限于一时一地,相反,应进一步提高国内市场效率、打通生产要素和商品服务的流通障碍,鼓励不同地区充分发挥分工合作的潜力,进而使其在知识吸收、转化的过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这不仅将有助于我国更有效率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以推动创新创业的蓬勃涌现,也将为国内大循环的构建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降低提供一定助力。

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一方面,为从理论层面深入解析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东道国创业活动的机制,本文采用模仿型创业、创新创业的二分法进行理论构建与实证检验。然而,由于创业过程的动态性,部分创业活动难以进行简单的二元划分,加之存在着大量从模仿型转向创新创业的创业企业,基于理论模型清晰度及检验可行性考虑,本文未对这一话题进行深入讨论。后续研究可尝试对这一动态演变过程进行探索。另一方面,受二手数据可用性限制,当前仍难以对理论模型中的不同中介机制进行直接检验。后续研究可探索使用问卷调查、案例研究等方法寻找更直接的证据。

参考文献

- [1]刘世锦.以结构性潜能推动国内经济大循环[A].经济学家圈.十四五与双循环[M].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21.
- [2]陈强远,钱则一,陈羽,施贞怀.FDI对东道国企业的生存促进效应——兼议产业安全与外资市场准入[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21,(7):137-155.
- [3]李政,杨思莹,何彬.FDI抑制还是提升了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基于省际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J].北京:经济管理,2017,(4):5-21.
- [4]Hong, S., W. R. Reed, B. Tian, T. Wu, and G. Chen. Does FDI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 Meta-Analysis[J]. World Development, 2021, 142, (4), 105436.
- [5]Acs, Z.J., D.J. Brooksbank, C.O'Gorman, D. Pickernell, and S. Terjesen.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An Application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2012, 15, (2): 237-261.
- [6]张开迪,吴群锋,高建,李纪珍.外商直接投资对大众创业的影响[J].北京:中国工业经济,2018,(12):79-96.
- [7]Goel, R. K.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Gender Differences Acros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Freedom and Taxation[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8, 50, (4): 887-897.
- [8]王戴黎.外资企业工作经验与企业家创业活动:中国国家户调查证据[J].北京:管理世界,2014,(10):136-148.
- [9]Danakol, S.H., S. Estrin, P. Reynolds, and U. Weitze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via M&A and Domestic Entrepreneurship: Blessing or Curse?[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7, 48, (3): 599-612.
- [10]Kim, P.H., and M. Li. Injecting Demand Through Spillover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omestic Socio-Political Conditions, and Host-Countr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4, 29, (2): 210-231.
- [11]Slesman, L., Y.A. Abubakar, and J. Mitra.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Doe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 Matter?

- [J].*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21, 30, (4), 101774.
- [12] Alvarez, S. A., and J. B. Barney. Discovery and Creatio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on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07, 1, (1-2): 11-26.
- [13] Spencer, J. W. The Impac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Strategy on Indigenous Enterprises: Horizontal Spillovers and Crowding Ou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8, 33, (2): 341-361.
- [14] Kirschning, R., and M. Matthias.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Absorptive Capacity for Knowledge 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3, 60, (4): 105-120.
- [15] Fotopoulos, G. Knowledge Spillovers,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s and the Geography of High Growth Firms [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2, 47, (5): 1877-1914.
- [16] Iftikhar, M. N., A. Maha, and D. B. Audretsch.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Developing Country Context [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20, 16, (1): 1327-1346.
- [17] Meyer, K. E., and E. Sinani. When and Where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Generate Positive Spillovers? A Meta-Analysi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9, 40, (7): 1075-1094.
- [18] 杨嫒. 时间、节奏与FDI集聚的溢出效应 [J]. 北京: 经济管理, 2019, (1): 22-38.
- [19] 路江涌.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效率的影响和渠道 [J]. 北京: 经济研究, 2008, (7): 95-106.
- [20] Feinberg, S. E., and A. K. Gupta. MNC Subsidiaries and Country Risk: Internalizat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Weak External Institu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9, 52, (2): 381-399.
- [21] Shane, S., and S. Venkataraman. The Promise of Entrepreneurship as a Field of Research [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 25, (1): 217-226.
- [22] Autio, E.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 2007 Global Report on High Growth Entrepreneurship* [R]. London: Babson College and London Business School, 2007.
- [23] Minniti, M., and M. Levesque. Entrepreneurial Types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0, 25, (3): 305-314.
- [24] Lafuente, E., Z. J. Acs, M. Sanders, and L. Szerb. The Global Technology Frontier: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Relevance of Kirznerian and Schumpeterian Entrepreneurship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0, 55, (1): 153-178.
- [25] Young, S. L., C. Welter, and M. Conger. Stability vs. Flexibility: The Effect of Regulatory Institutions on Opportunity Typ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49, (4SI): 407-441.
- [26] Tang, J. T., J. Yang, W. Ye, and S. A. Khan. Now is the Time: The Effects of Linguistic Time Reference and National Time Orientation on Innovative New Ventures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1, 36, (5), 106142.
- [27] Bradley, S. W., P. H. Kim, P. G. Klein, J. S. McMullen, and K. Wennberg. Policy fo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Institutions, Interventions, and Societal Challenges [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21, 15, (2): 167-184.
- [28] Ayyagari, M., and R. Kosová. Does FDI Facilitate Domestic Entry? Evidence From the Czech Republic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0, 18, (1): 14-29.
- [29] Mei, J. Refining Vertical Productivity Spillovers from FDI: Evidence from 32 Economies [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21, 74, (C): 176-191.
- [30] 田毕飞, 梅小芳, 杜雍, 王波浪. 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际创业的影响: 制度环境视角 [J]. 北京: 中国工业经济, 2018, (5): 43-61.
- [31] Saliola, F., and A. Zanfei. Multinational Firms,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Transfer [J]. *Research Policy*, 2009, 38, (2): 369-381.
- [32] Clark, D. P., J. Highfill, D. Jonas, and S. S. Rehman. FDI, Technology Spillovers,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Selective Survey [J]. *Global Economy Journal*, 2011, 11, (2): 1-44.
- [33] Fu, X.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Managerial Knowledge Spillovers Through the Diffusion of Management Practice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12, 49, (5): 970-999.
- [34] Stenholm, P., Z. J. Acs, and R. Wuebker. Exploring Country-leve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n the Rate and Typ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3, 28, (1): 176-193.
- [35] Acs, Z. J., P. Braunerhjelm, D. B. Audretsch, and B. Carlsson.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09, 32, (1): 15-30.
- [36] Zhang, Y., H. Li, Y. Li, and L. Zhou. FDI Spillovers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Role of Foreign Firms' Country Origin Diversity and Domestic 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31, (9): 969-989.

- [37] Kneeland, M. K., M. A. Schilling, and B. S. Aharonson. Exploring Uncharted Territory: Knowledge Search Processes in the Origination of Outlier Innovation[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20, 31, (3): 535–557.
- [38] 许和连, 卮朋, 李海峥. 外商直接投资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溢出效应[J]. *北京: 管理世界*, 2009, (9): 53–68.
- [39] 贾良定, 郑雅琴, 尤树洋, 李珏兴. 如何在组织和管理研究中探讨调节作用? 模式和证据[J]. *广州: 管理学季刊*, 2017, (2): 15–40, 126–127.
- [40] Webb, J. W., T. A. Khoury, and M. A. Hitt. The Influence of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al Voids on Entrepreneurship[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20, 44, (3): 504–526.
- [41] Audretsch, D. B., and M. Belitski. Frank Knight, Uncertainty and Knowledge Spillover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2021, 17, (6): 1005–1031.
- [42] Jin, B., G. Francisco, and R. Salomon.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Local Firm Innova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8, 50, (5): 847–855.
- [43] Castellani, D., K. LAVORATORI, A. Perri, and V. G. Scalera. 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and the Loca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Knowledge-Intensive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US Metropolitan Areas[J]. *Global Strategy Journal*, 2022, 12, (1): 82–107.
- [44] Autio, E., and Z. Acs.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Growth Aspirations[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0, 4, (3): 234–251.
- [45] Zhou, W. Property Rights, Deregul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in a Transition Economy[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8, 14, (1): 73–103.
- [46] Yi, X., and N. Alireza.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FDI,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J].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17, 26, (4): 410–424.
- [47] Rodrik, D. Institutions for High-Quality Growth: What They Are and How to Acquire Them[J].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35, (3): 3–31.
- [48] Chowdhury, F., D. B. Audretsch, and M. Belitski. Institutions and Entrepreneurship Quality[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9, 43, (1): 51–81.
- [49] Jude, C. Does FDI Crowd Out Domestic Investment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2019, 27, (1): 163–200.
- [50] Chang, S., and B. Wu. Institutional Barriers and Industry Dynamic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4, 35, (8): 1103–1123.
- [51] Stevenson, R., A. S. Kier, and S. G. Taylor. Do Policy Makers Take Grants for Granted? The Efficacy of Public Sponsorship fo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21, 15, (2): 231–253.
- [52] Hoechle, D. Robust Standard Errors for Panel Regressions with 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J]. *The Stata Journal*, 2007, 7, (3): 281–312.
- [53] Yoon, H. D., N. Kim, B. Buisson, and F. Phillips.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Knowledg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nd Innovative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8, 84, (1): 243–252.
- [54] Berrill, J., M. O'Hagan-Luff, and A. van Stel.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duca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DI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20, 54, (4): 1041–1059.
- [55] Osei, M. J., and J. Kim.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s More Financial Development Better? [J]. *Economic Modelling*, 2020, 93, (4): 154–161.
- [56] Boly, A., N. D. Coniglio, F. Prota, and A. Seric. Which Domestic Firms Benefit from FDI? Evidence from Selected African Countries [J]. *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 2015, 33, (5): 615–636.
- [57] Lee, S., Y. Yamakawa, M. W. Peng, and J. B. Barney. How Do Bankruptcy Laws Affect Entrepreneurship Development Around the World?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11, 26, (5): 505–520.
- [58] Fredström, A., J. Peltonen, and J. Wincent. A Country-Level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on Entrepreneurship Productivity: The Effects of Informal Economy and Regulation[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1, 36, (5), 106002.
- [59] Stephan, U., and L. M. Uhlaner. Performance-Based vs Socially Supportive Culture: A Cross-National Study of Descriptive Norms and Entrepreneurship[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10, 41, (8): 1347–1364.
- [60] Dharmapala, D., and J. R. Hines Jr. Which Countries Become Tax Havens?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9, 93, (9–10): 1058–1068.

IFDI and Host Country Entrepreneurship : Mechanism Analysis based on the Division of Entrepreneurial Types

WANG Bo¹, ZHU Hang²

(1.School of Business,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515063,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Sun Yat-sen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275,China)

Abstract: It is the internal deman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stage that use the international circulation to promote the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and improve the domestic economic vitality and technical lev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trepreneurship,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mpact of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host countries, especially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In recent years, academia ha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FDI and host country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However, the conclus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still controversial. On the one hand, scholars from a spillover perspective emphasize that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IFDI, as well as supply chain linkages and employee mobility will bring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and promote the loc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etition have found that the intensified competition caused by IFDI will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the host country, especiall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fact, IFDI can affect the host country'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hrough a variety of positive spillover mechanisms, and there is also a complex intertwining of positive spillover and negative competition mechanisms. At the same time, different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lso have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source and nature of opportunities. Therefore, the impact of IFDI on different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may be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Based on the IFDI spillover theory and entrepreneurial type literatur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nravel the differences mechanism of IFDI on different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FDI 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Specifically, the article proposes that IFDI will have a differential impact on different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and this difference will be further highlighted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formal institutions. On the one hand, the market spillover effect of IFDI will increase the opportunities for imitative entrepreneurship, which help reduce entrepreneurial risks and make up for the constraints of the weak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On the other hand,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not only benefits from the IFDI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which increases the overall knowledge stock and knowledge diversity of the host country, but also will be the main victim of the negative competitive effects of IFDI, requiring more 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Further, for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he positive effect and the negative effect will ultimately depend on the ability and willingness of entrepreneurs in the host country to absorb and utilize knowledge spillovers (manifested as national R&D investment level and nation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level), as well as their ability to resist potential competition (manifested as national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national entrepreneurial support level). The above theoretical hypothesis was tested using data from 59 countries from 2010 to 2018.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First,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at the impact of IFDI on different types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has different mechanisms, and further clarifies the institutional context in which different mechanisms play a role, which will help to quell existing research debat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deepening of IFDI research. Second, this study identifies two conflicting mechanisms by which IFDI affect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knowledge spillover mechanism and competition mechanism, emphasizing that IFDI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multiple knowledge, but also the main victim of negative competitive effects, and clarifies the situational conditions that strengthen or weaken the above two mechanisms. Thus, this study clearly reveals the path of IFDI's impact on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especially highlighting the high context-dependence of this effect. Third, by emphasize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of IFDI, this study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of promote innovat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Key Words: IFDI; imitative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spillover effect; competitive effect

JEL Classification: D02, L26, O00

DOI: 10.19616/j.cnki.bmj.2024.02.004

(责任编辑:刘建丽)